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 徐蓝、[日]吉田丰子 / 主编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第二期）
冷战的缘起及其初步发展



W A 世界知识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第2期）

冷战的缘起及其初步发展

徐蓝 [日] 吉田丰子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冷战的缘起及其初步发展．第2期 / 徐蓝, (日) 吉田丰子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012-5830-7

I. ①国… II. ①徐… ②吉… III. ①中外关系—现代—文集 IV. ①D8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4725 号

责任编辑 李 锋
特邀编辑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 (第2期)：冷战的缘起及其初步发展
Guoji Guanxishi Gongzuofang(No.2): Lengzhan de Yuanqi Jiqi Chubu Fazhan
主 编 徐 蓝 [日] 吉田丰子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22 印张
字 数 33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一版 201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830-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首都师范大学史学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郝春文

委 员 (姓名以汉语拼音为序)

金寿福	李华瑞	梁景和
梁占军	刘 城	刘乐贤
史桂芳	宋 杰	郝志群
徐 蓝	晏绍祥	袁广阔
张金龙	赵亚夫	

编者说明

有感于许多学术会议讨论的不充分，2012年11月18日，京都产业大学吉田丰子、辅仁大学萧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徐轶杰、华东师范大学韩长青、首都师范大学姚百慧和王若茜（当时为博士生，现就职于河南师范大学）在北京国际文化大厦小聚时，提出要创办一种新的会议交流机制。这种会议论文篇目可以很少，但要求讨论充分，尤其是希望评议人能提出建设性批评意见。当天，以上学者就会议的举办方、选题、语言、评议方式等进行了讨论。经比较“冷战国际史工作坊”“外交史工作坊”和“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确定会议名称采用最后一个。这次讨论还商定了联络人，分别为：大陆方面的韩长青、姚百慧，台湾方面的萧道中，日本方面的吉田丰子。

自2013年以来，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相继举办三次。分别为：第1期，2013年9月7日，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承办，主题为“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对外关系”；第2期，2014年11月2—3日，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承办，主题为“冷战的缘起及其初步发展”；第3期，2015年12月12日，日本京都，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京都产业大学世界问题研究所、立命馆大学研究机构承办，主题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建”。虽然2012年讨论时的一些设想未能完全实现（比如建立博客来广泛宣传），但我们欣喜地发现，国际关系史工作坊已成为沟通海峡两岸和日本学界在外交史研究尤其是东亚冷战史研究的渠道之一。在工作坊交流和筹办期间，愿意参与的队伍也在壮大。

为纪念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的创办和继续开展，我们于2016年把工作坊第1期的论文结集出版，现在拟出版第2期的纪念文集。第2期工作坊共有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的29家单位的42名代表参加，总计有会议论文16篇，主题演讲2篇。收入本文集时，部分论文有所修订、更换。最终收入文集的有1篇主题演讲和14篇论文。

目 录

主题演讲

日本的冷战史研究

——再论亚洲冷战 / 1 [日] 下斗米伸夫撰, [日] 吉田丰子译

会议论文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

媒介与受众 / 16

王睿恒

美国对 1945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介入

——基于核军事背景下的分析 / 39

[日] 吉田丰子

中国向联合国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研究 (1950—1951) / 53

萧道中

中苏同盟与对日和约 (1949—1952):

冷战背景下战胜国之间的国际政治 / 92

[日] 松村史纪

应对中苏分裂:

1960—1966 年间的民主德国和朝鲜关系 / 119

陈 弢

1954 年的“空中霸王号事件”

——以英国解密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 144

张民军

英国政府参与解决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政策研究 / 157

耿 志

阿巴边界“黑洞”与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困境及出路 / 204

姚远梅

美国外交中国大国化构想的失败

——以 1948 年对外援助法案为中心 / 225

[日] 高桥庆吉撰，袁典译

福特政府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研究

——兼论福特政府时期中美未能建交之原因 / 248

郭永虎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

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形象的塑造 / 263

翟 韬

“战争的负遗产”，还是“文化交流的象征”？

——玄奘三藏遗骨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北京与台北 / 289

[日] 坂井田夕起子

战后初期中华民国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解析

——游离于救济与召回之间的政策之成败 / 304

[日] 王雪萍

附 件

附件 1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第 2 期）日程 / 337

附件 2 国际关系史工作坊（第 2 期）正式参与者名单 / 343

日本的冷战史研究

——再论亚洲冷战

[日] 下斗米伸夫 撰 [日] 吉田丰子 译*

摘要 关于冷战史的研究，如果与欧美相比，亚洲依然处于落后的状态。迄今为止，妨碍我们认识东亚冷战史研究以及在现代史的脉络中理解冷战史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固化的历史认识。因此，弄清基于上述认识所形成的“东亚冷战”的脉络，是日中冷战史研究的共同课题。对于亚洲冷战的起源这一共同课题，日本与中国的学者有必要对战后苏联的亚洲观、斯大林的冷战观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旨在对日本的冷战研究作简要回顾，以拙著《亚洲冷战史》一书中提出的“意识形态”“地政学”“核”这三个变数，针对这一课题提出笔者个人的几个主要观点。

关键词 亚洲冷战的起源 苏联的亚洲观 意识形态 地缘政治

* [日] 下斗米伸夫，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日] 吉田丰子，日本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国际关系学科副教授。

一、序言

关于冷战的结束时期的一般看法是，冷战结束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及其接二连三的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解体（Halslam, 2011; Gaddis, 2005; A. Brown, 2009, and others）。值此冷战结束将至25年后的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在北京向沈志华教授以及各位中国的冷战史学者作关于我个人以及日本相关亚洲冷战史研究动态的报告。

我了解到沈志华教授的研究是在我翻译俄罗斯国际关系大学校长杜尔科诺夫教授关于朝鲜战争一书的时候。沈志华教授的《朝鲜战争与斯大林》一书中关于1994年叶利钦总统提供给相关各国的档案的介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当时，通过中央大学李廷江教授的介绍，我有机会在东京认识了沈志华教授，后来又有机会在北京和上海与沈志华教授多次见面。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对于起步稍晚的日本的亚洲冷战史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回想起来，日本的冷战研究，尤其是关于东亚的冷战研究，是在21世纪初，也就是大约15年之前，在毛里和子教授的提倡下开始的。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其原因本身就非常令人深思。其实，日本的冷战史研究是以亚洲区域研究的延伸方式，或者是经苏联学者的业余研究方式起步的。

早在1990年年底的一次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上，从事过朝鲜战争等研究工作的朱建荣教授曾经向我质疑日本的冷战史研究何以落后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原因在于日本是冷战受益者的这一历史。或者说，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在和平环境中经济快速成长，使其在对与俄关系和对冷战的关注方面形成了与韩国、中国等国迥异的苏联观与冷战观，即日本缺乏对于冷战深刻批判的认识。当然，也不是说在日本完全没有对于冷战持批判态度的研究，但在上述情况下，认为日本的研究中对于苏联、冷战的认识过于单纯也不无道理。

关于日本的亚洲冷战研究，如果用“亚洲冷战”这个关键词检索的话，

检索结果只有我的同名书（2002年），以及李钟元的《东亚冷战与美韩中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和赤木完而的《作为战略史的亚洲冷战》（庆应大学出版社，2013年）。

其中当初以韩国留学生身份来到日本的李钟元在从“朝鲜半岛的冷战还没有结束”这一观点进行着评论工作，但他原本是将艾森豪威尔的修正主义的冷战政策与20世纪70年代的开发政策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者。当然，在日本也有如菅英辉、石井修等从日本与欧美的关系这一角度进行冷战研究的学者。

在上述环境的影响下，我在2004年写了一本有争议的《亚洲冷战史》（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其中，我提出了“意识形态”“地政学”以及“核”这三个冷战的主要变数。

日本俄罗斯史研究会这一有代表性的俄罗斯史学者群体，今年才将冷战史研究作为其大会的主题，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没有召开过以冷战为主题的大会。大多数学者认为朝鲜战争的责任在于南韩，这一日本历史学术界的传统认识曾经很难突破。

不知何故，俄罗斯史研究会这一群体虽然有关于斯大林的研究，但是对于冷战研究的态度比较消极。

另外一个问题是旧金山体制（原喜美惠）的问题。关于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条约依法解决的问题，1956年至今尚未结束。可以说，与同苏联之间存在历史纠葛的中国对冷战的关注相比，冷战时期的日本外交，虽然偶尔有过重要的改善对苏关系的动向，但由于日本基本上更重视对美关系，而对苏问题中的领土问题几乎没有希望解决，因此没有被予以充分的关注。或许这可以说是对苏关系问题在日本外交之中的优先顺序并不高的反映。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中国的学者关注最近三年以来由日本与俄罗斯的34位民间历史学者共同进行的历史研究。这一团队采取了与日中、日韩之间政府间委员会方式不同的方法（五百旗头真、杜尔科诺夫）。这个研究群体的成果不久将在日本与俄罗斯同时出版。在坚持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家的判断相区别这一点上，我认为是成功的。

众所周知，欧洲的冷战于1989年终结，而关于亚洲冷战这一问题，对其终结，甚至对其过程还没有达成共识。以我提出的亚洲冷战的三个变数来分析的话，只有在亚洲存在着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一框架是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进入2000年以后，欧美终于也开始了相关研究，但是在比较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水准还不太高。^① 英国的冷战学者阿奇·布朗，从共产党政权的持续性这一点上，提出了东西方冷战终结方式的问题（Brown, 2009）。这说明，仅以共产党问题为例，也可以看出关于亚洲冷战终结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然而，苏联解体的20余年后，由叶利钦总统于1994年提供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成为对曾经是“历史空白”的朝鲜半岛进行研究的契机。以此对于历史的重新研究，在亚洲冷战这一领域也开始了。

但关于冷战史的研究，如果与欧美相比，亚洲依然处于落后状态。我认为，至今为止妨碍我们认识东亚冷战史研究以及在现代史的脉络中理解冷战史的主要原因，在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固化的历史认识。因此，我认为弄清基于上述认识所形成的“东亚冷战”的脉络，是日中冷战史研究的共同课题。

总之，在此向各位提供交流机会的中国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冷战时期，随着相关国家对苏关系的变化，东亚也进入了变动的阶段，今天能够有日中历史对话的机会，作为对近年来日中关系深感忧虑者之一，我不胜感慨。^②

① Tsuyoshi Hasegawa, eds.,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高原明生：《日中関係：なにが問題か》，东京：岩波书店，2014年，第99—103页。下斗米仲夫发言。

二、关于亚洲冷战起源的共同课题

我认为由日中学者进行亚洲冷战研究时，对于战后苏联的亚洲观、斯大林的冷战观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关于这一问题，我想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1. 亚洲冷战不是欧洲冷战“第二战线”

亚洲冷战是欧洲冷战“第二战线”这一观点，不仅是被动性的“欧美中心”史观，而且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致使美苏在亚洲的竞争进入决定性阶段的是1945年8月原子弹轰炸及其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下斗米伸夫，2004年，2011年）。我认为朝鲜半岛问题以及国共内战的变化才是在亚洲引起东西方对立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亚洲的冷战甚至呈现内战与冷战的形态。这一状况，就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亚洲冷战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同时，1945年8月才是冷战之中最重要的变数“核”出现的时刻。斯大林对核武器本身的存在是知道的，使斯大林受到冲击的是美国真的使用了这一武器。于是斯大林在8月22日举行的著名的国防会议上发出了制造核武器的命令。当时，在苏联国内还没有发现铀矿，因此必须在占领区探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冷战的地政学与核要因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苏联对发现铀矿的红军占领区（东德和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东欧以及北朝鲜的关注，是造成冷战分割的重大因素。其实，60万人以上的日本官兵由归国改为扣留的决定，正是在这一命令发生后第二天做出的（扣留问题）。

当然，1941年至1944年期间，斯大林的精力集中于欧洲问题上，当欧洲问题的处理有了头绪之后他才开始考虑亚洲问题。即便如此，1944年时，在斯大林的思考以及支撑斯大林思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战后设想之中，事实上，亚洲所占的比重并不太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早的战后设

想，可能是1941年12月底英国外长艾登到苏联与斯大林商讨同盟问题之时。当时曾经以赤色职工国际的活动家而广为人知的犹太裔苏联人洛佐夫斯基已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他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的战后设想之中，认为在亚洲应维持日本与苏联的中立条约（1941年4月签订），但认为日本战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基础上，洛佐夫斯基提出了以同国民党进行战略性协作为主轴，在国民党内培养亲苏势力的目标。

洛佐夫斯基的设想在1944年春迈斯基次官等总结的战后和平设想之中也被采纳。在当时，苏联已经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但认为这一任务应该由美国来承担。因为苏联和日本之间还存在着中立条约，此外，苏联认为中华民国是战后在亚洲的伙伴以及交涉对象。

2. 苏联在雅尔塔体制中在东亚的合作对象依然是国民党

在对德战线取得进展之后，斯大林开始倾向于参加对日作战，关于苏联将继续重视国民党，并将其作为自己在亚洲的合作伙伴，这一点也非常明确。

在1945年2月雅尔塔体制形成时，苏联在东亚的合作对象也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在《日苏中立条约》仍然有效的1945年1月，莫洛托夫外长对日本大使称，即使作为外交辞令而言，中国共产党也是假的这一看法。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战败的时候，斯大林对日本转达了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后，日本帝国主义仍然依靠斯大林继续与欧美和谈这一事实，使国民党受到刺激而派遣宋子文赴莫斯科，于8月14日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做出了在德国战败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决定，苏联的与美国协调为基调的亚洲政策也大体形成了。会议上还决定了维持外蒙古现状，对朝鲜半岛实行托管。如果说雅尔塔会议确定了波兰等东欧国家地缘政治的话，苏联当时还没有明确地规划出其战后的亚洲图景。苏联想过将东土耳其斯坦、蒙古、原满洲、朝鲜半岛，甚至北海道作为苏

联合国防的缓冲地带。^①

3. 核武器时代的到来与苏联优先课题的转换

但是1945年8月至9月的日本的战败，以及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使斯大林直觉地认识到核武器战争时代的到来，因此马上对苏联的课题的优先顺序进行了再度转换。

1946年2—3月，凯南与撒切尔等同时阐述对东西方分割的状况，绝非偶然。其中，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崩溃，与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以及长崎这一事实，给斯大林的思考带来了双重的负荷。也就是，如何应对国共内战的爆发，以及核武器战争这些本质上新问题的出现，成为斯大林的新的战略问题。应该说，对这两个问题因应过程给亚洲冷战带来了新的性质。

日本战败后，马歇尔使华促成了1945年10月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会谈中对避免国共内战做出了决定。蒋介石也对美苏双方有所顾虑。但正是由于170万苏联军队共同对日参战而进入东北亚地区这一事实，破坏了这一地区不安定的国共间的安全平衡（松村史纪，2011年）。

4. 美苏同盟之终结与向两极结构的转换

包括对美国核武器战争在内的正式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尤其是将东欧（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划入苏联，1945年10月底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之间关于将日本本土化为美国势力范围达成一致。美英苏同盟的终结与向美苏两极结构的转换自此开始，在乔治·凯南与苏联大使诺维科夫的书信之中，更加明确了向两极结构的转换。

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苏联当时核开发的落后并处在追赶的状态。对于至1947年在国内几乎没有铀矿的苏联而言，确保东欧以及北朝鲜的铀矿、制造原子弹就成了优先课题。因此，对朝鲜半岛的分割就不可避免地出

^① 莫洛托夫在公开的回忆录中关于在原满洲成立独立的国家称，“没有想过蒙古，因为是不可能的”（Sto sorok besed, 1990, M, 87）。关于北海道，左派之间有过“人民共和国”之说（下斗米仲夫，2011：2652）。

现了。

5. 两极结构的发展

进入1947年后，这一转换过程进一步发展。在保卫列宁格勒战役中成名的日丹诺夫领导下的东方的同盟机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1947年9月），成为苏联的重要支柱。苏联驻北朝鲜第25军领导，后来任首任驻朝鲜大使的什特科夫是他的岳父。对美国略显和解态度的莫洛托夫也在1947年11月7日的演讲中，针对大战中奔赴欧洲战场的士兵们对西方文化的憧憬进行了批判，明确地表示了与欧美对抗的态度。

6. 苏联在东北向共产党提供的日军武器是国共内战激化的要因

1946年1月，斯大林也断了调停国共和谈的念头。进军中国东北部的苏联军队于5月撤退，但撤退苏联军将原日本军的武器优先提供给了共产党。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别佐格拉佐夫指出，这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使共产党处于有利的地位。据萨西蒙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120万人左右，其中的四分之一通过苏联获得了原日本军队的武器，这是苏军撤退后国共内战激化的原因。对国共内战在此不做详细的讨论，但要指出的是，与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相同，中国的内战具有“国际性的内战”“世界代理战争”的性质。

7. 苏联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可能性提高的情况下与共产党关系的进展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胜利与蒋介石军队的败退，以及共产党政权的成立成为现实。其实，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关于毛泽东访苏进行过讨论，当初斯大林非常慎重，拒绝了毛泽东正式访苏的要求。但是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胜利与革命政权的成立开始进入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与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尤其是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迫切的问题。事实上，向苏联提出毛泽东秘密访苏时的讨论事项的第二个议题之中，包括了在东方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1951年5月在北京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德田、

野坂，及其反对派跨田赴莫斯科时，也曾就关于成立东方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此斯大林态度积极，而中共的态度却是消极的。

两党关系的进展随着中共在东北实现统治而进一步强化。斯大林以建设铁路为名义，于1948年初正式将铁道部长的科瓦廖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派遣到东北，此后他成为与毛泽东的关系等两党之间的正式联络渠道。这对与拥有高岗、林彪、王稼祥等了解苏联人才的中共东北局之间的关系，尤其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其中，自1945年就任干部的高岗于1949年就任东北局书记，7月以“满洲民主政权”代表的身份成为刘少奇访苏代表团成员之一。两党的密切关系已经在东北地区先行开展了。

8. 美苏协调崩溃后苏联意识形态的强硬化

1948年年底，美苏协调最后的堡垒崩溃了。围绕耶路撒冷建国问题，美苏关系开始紧张。苏联对党内“国际主义”及对欧美事务的批判加强了。自1948年年底，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部门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加强了对洛佐夫斯基、巴尔加等苏联共产党以及外务省及其科学院的犹太裔人员的肃清。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南斯拉夫的铁托退出了共产党情报局，这使斯大林受到了挫折。

9. 中国共产党执政成为现实情况下米高扬对西柏坡的秘密访问

在上述情况下，在1949年年初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的斯大林与苏联共产党其他领导人，改变了此前对中共表面上冷淡的态度。1月中旬，对于毛泽东为了讨论中国局势的访苏提议，斯大林要求其延期，取而代之的是秘密派遣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赴北京郊外访问毛泽东。斯大林是通过派遣熟悉亚洲国际问题的米高扬，而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正式试探。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出现的混乱，也是派遣米高扬的背景。

米高扬于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到北京郊外西柏坡，这次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非正式访问，成为亚洲冷战的重要转折点。米高扬在其回忆录中称，他“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游击队在山中的大本营西柏坡停留

了9天，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进行了讨论”。在这次会见上，毛泽东认真听取了米高扬的意见。简而言之，苏联共产党的忠告是即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对着手的社会主义也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

在会谈上，米高扬与苏联共产党自1948年以来驻中国的代表科瓦廖夫一同与中共商讨了作为将来的执政党以及作为亚洲的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关于奠定中苏两党关系基础的具体问题有两点。一是关于掌握政权之后的问题。米高扬回忆称，即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后，由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只能采取革命的人民民主阶段，他就这一认识对中共进行了说服。

二是南京的国民党政权认为即使将蒋介石除外，也希望苏联促使国共和谈。对于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强硬的毛泽东，斯大林的劝告是如果只是反对的话，只能对敌人有利，不如采取“和平攻势”。南京政府的期待，仿佛像1945年7月的日本。显然，苏联不希望1948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失败，重现于与更加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在谈判中，中共提出了国共合作政府的主要阁僚几乎由共产党担任的方案，这是南京政府不能接受的。

1948年5月初，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进行了秘密交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似乎存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苏派与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亲美派的对立的报道出现了。事实是，科瓦廖夫于4月13日向斯大林的报告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在对美工作上是一致的。中共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其只不过为了改善其经济而采取的措施而已。4月19日，斯大林通过科瓦廖夫劝告毛泽东尽快成立人民政府。^① 共产党渡过长江之后，与国民党和谈的方案也消失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苏联了。1949年6月底，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为主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苏联。这次访苏的直接目的是，考察苏联党和国家的管理体制，以及就毛泽东短期访问莫斯科的计划进行磋商。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① M. , Kapitsa, Na raznikh paralelyakh, M. , 2002, p. 43.